

院藏一尊七世紀印度佛像的探討

劉國威

目前雖已累積許多關於佛教造像的研究成果，但要判定一尊老佛像的年代仍屬不易；一般多是透過風格、製法、材質等間接證據加以分析，常流於主觀。因此，若佛像載有銘文，研究者較能藉其字形特徵與記載內容進行較客觀地判定；其中若有年代記錄，則更能提供明確訊息。若有此類造像為依據，將能依此推斷其餘同類風格的造像作品。

院藏佛像除清宮舊藏外，主要來自彭楷棟先生的捐贈，目前於南北兩院均有長期展出。本文所討論此尊載有銘文的獨特佛像，則是本院數年前自歐洲所購藏。兩年前配合南院開幕的「佛陀形影」佛教藝術常設展，此像不僅為策展同仁選入，更選為圖錄的封面主尊，至今仍然展出。當時因篇幅限制未能詳述，故撰此文引介其特色。

造像解析

及護身符——吉爾吉特與奇拉斯歷史的材料》一書中，首次公布並解讀此尊佛像底座的銘文（註一），文中僅言此像為私人藏品。

John Sudmak 二〇一三年出版的英文專著《古代喀什米爾的印度教與佛教雕塑及其影響》一書亦曾討論此像，但重點主要在其造型風格，也說此像為私人藏品。（註二）

此尊黃銅佛像在造型上頗具特色，具喀什米爾（Kashmir）與斯瓦特（Swat）佛

Oskar von Hinüber 是研究中世紀印度語文的德國學者，曾參與當年歐洲學術團隊在巴基斯坦北部吉爾吉特（Gilgit）地區的考古調查，長年研究該地區與 Patola Saini 王朝有關的出土文獻、岩刻壁畫以及佛像銘文等，撰寫多篇與此王朝相關的論文，他於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德文專著《Patola Sainis... 其石碑文、銅像銘文、抄本跋文

像風格的特徵，也有部分未曾見的特點。像高約二十九公分，外型為比丘樣貌，金剛跏趺坐（vajraparyankasana），雙手持轉法輪印（dharmaçakramudra），身著袒露右肩袈裟，左手執衣角。佛像上半身衣褶的下垂紋路採非對稱形式；其左右肩頭、膝蓋、腹部均平滑未具紋路，此點常見於喀什米爾佛像，亦可見於部分斯瓦特造像；左肩衣褶上具有不明顯三角格紋，亦為喀

什米爾風格的影響。但此像左前臂與近腳踝的圓形紋路顯似衣著緊收包覆肌膚，仿如長袖與褲腿，非寬鬆垂下，此項特徵尚未見於該地區其他造像。（圖一）

雙眼鑲銀，嘴唇鑲銅，此點於喀什米爾造像中常見，但此尊的長橢圓形面孔與傳統喀什米爾佛像稍異：嘴微彎，唇薄，圓頰未突顯（傳統喀什米爾佛像下頰常有一彎線條顯示寬厚，如雙下巴般）。佛像

主尊端坐於具葉片之綻放雙層蓮花法座上，花瓣平滑無飾。蓮座下左右二獅扛舉，獅面向前，獅身側立，軀幹略瘦，獅尾迴彎向臀；獅頭具茂密鬃毛，獅耳未顯。喀什米爾風格佛像座下常見豎耳端坐動物，多為鹿類；斯瓦特風格佛像方見此類未露耳隨侍雙獅，但現存斯瓦特風格佛像多為八世紀之後，較此像晚；目前確認為 Patola Saini 王朝的其餘佛像也有座下具雙獅造型

者，但多為雙耳顯露。

雙獅立於雙層方塊狀岩石底座上，中央有一獅首突出，此類岩石狀底座普遍見於喀什米爾與斯瓦特地區的銅像，可以確定是源自中印度鹿野苑（Sarnath）的影響，該地笈多王朝（約西元三二〇～五五〇年間）時期的佛教浮雕常見此類裝飾風格。

岩座再下層的底座缺損不全，唯右下方尚屬完整。佛座兩側仍可見三位供養人跪立於側，底座周圍殘存銘文，除缺損處外，大部分仍可辨識，語言是以初期夏惹達體（Proto-Sarada）記載的混合梵文。

銘文解析

銘文在佛座上的順序：

1. 正面左下角 # sanvatsare 2（2 後面的個位數字因佛座底缺不全，0 到 9 的數字皆可能，再後銘文因底座缺損無法辨認）。
2. 接續至佛座左側，ma ha ra 三字上半因佛座缺落未全。mahārāja navasure —（接續至佛座背面上層）ndasya //（圖二）
3. 接續至佛座背面下層，左下角脫落，根據其餘佛像銘文之行文風格猜補一字



圖1 唐代初期（645-654）坐佛 佛像正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唐代初期 (645-654) 坐佛 佛像背面及其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皇室衣著的特徵。故雖缺頭部作為直接判斷，此人應即是主供養人 *Varsa*。
左側獅旁人像亦為跪立男性，面帶鬚，身形稍小於右側人像，手持物不明顯，不似布疋。由於此像所居位置和右側人像相同，表二人為佛像的共同捐施者；且其戴寶冠、著耳飾、身穿皇家衣飾，故此人可能即為其父 *Gimarasimgha*。
再下層雙層岩石狀佛座右側復有一跪

立人像：頂戴波斯樣式纏繞頭巾、具耳飾，亦著翻領長袍、左手持一罐狀物；右手雖斷，但似持一串念珠，因為從該人像側面仍可見其右腿上有念珠痕跡。推測此人可能是 *Varsa* 一子中其中一位。
雖然 *Varsa* 的妻子 *Siri* 未見於現存佛像的側面，由於 *Patola Sahi* 王朝佛像屢見捐施者夫婦二人同塑於佛像側邊的案例，所以 *Siri* 和其另一子相當可能塑於佛像左下

(*deyadharmo*) *yab mahāsraddhōpāsaka ganjījapatiputra varsasya tathā sādhan bhāryā* (轉接續至佛座右側下) *śrīyena* (圖三)
4. 回返接續至佛座背面中層第一行 *tathā sādhan gi (ṇa) rasimghena // sādhan putra simghena tathā sa-* (接續至第二行) *dhan putra śiriena* (圖四)
整段銘文：

sanvatsare 2 (0 至 9 皆可能的個位數) mahārāja navasurendrasya // (Deyadharmo) yab mahāsraddhōpāsaka ganjījapatiputra varsasya tathā sādhan bhāryā śrīyena tathā sādhan gi (ṇa) rasimghena // sādhan putra simghena tathā sādhan putra śiriena.
漢譯大意：「在 *Navasurendra* 大王統治的第二十(或最多至二十九)年，此



圖2 唐代初期 (645-654) 坐佛 佛像底座左側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唐代初期 (645-654) 坐佛 佛像底座右側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布施物〕為具大誠信優婆塞暨司庫之子—*Varsa*，連同其妻 *Siri*、*Gimarasimgha*，其子 *Simgha* 和 *Siri*〔所供〕。』
Navasurendra 指的是 *Patola Sahi* 王朝中的 *Navasurendrādityanandi* 國王，他是該王朝第四任國王。此王朝的紀年方式採用名為 *Laukika* 的曆法，此處銘文中的十位數字 2 仍存，第二位個位數字因底座破損而脫落，故從 0 到 9 均有可能，換算為西元紀年後，*Navasurendra* 在位的第二十年至第二十九年約為西元六四五至六五四年。
依銘文記載，此像的捐施者名為 *Varsa*，其身分是國王總管 (*ganjījapati*，漢文經典常譯為司庫) 之子，應為貴族成員。銘文並敘述捐施此像乃是連同其家人：妻—*Siri*，一子—*Simgha* 和 *Siri*，以及一位未署明身分者—*Gimarasimgha*，此人可能是 *Varsa* 的父親，即國王總管。

Patola Sahi 王朝時期製作的銅像常將施主形像塑於佛像主尊兩側。由於此尊佛像左下角殘破，無法確定總共原有幾位供養人像，目前可見三位。身形最大者是佛像下右側獅旁人像：缺頭部、探跪立姿，雙手持布疋成獻供狀，身著寬袍，有翻領衣飾，此類裝飾在該地區其他佛像亦見，是側現已缺角的部分。

Patola Sahi 王朝及其佛教信仰

Patola Sahi 王朝大約位於今日巴基斯坦北部吉爾吉特谷地，近年有學者考證認為王朝首都可能位於更往東的巴提斯坦 (*Balistan*) 地區內的 *Skardu*。該地位處絲路往來要道，因此歷史發展上族群複雜，語言文化亦多樣，巴基斯坦烏爾都語 (*Urdu*) 習稱此區為 *Balawaristan*，英國殖民時期其名稱為 *Boloristan*。直至二十世紀初，學者對該地過往歷史的理解主要依靠文獻資料—漢文史冊與漢僧遊記較有早期記錄，八世紀後的發展則有波斯文與阿拉伯文的記載。但各語文的史籍對該地早期歷史多未詳載，僅略述其宗教文化，遑論王朝名號。

近代學者考證，《魏書》中的「波路」、《洛陽伽藍記》中的「鉢盧勒」、《宋雲行記》中的「鉢露勒」，乃至玄奘 (六〇二~六六四)《大唐西域記》中記載的「鉢露羅國」，均為此地名的不同音譯。玄奘曾親臨該地 (他於六二九年從長安出發，經絲路北道赴印，六四五年由絲路南道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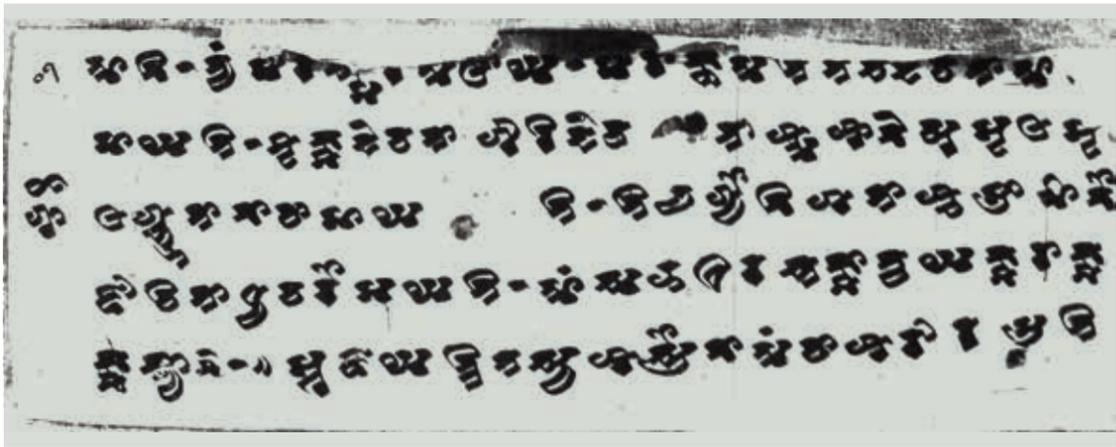


圖5 「吉爾吉特寫本」中梵文本《藥師經》的一頁殘片 印度國立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 India) 館藏 引自「吉爾吉特寫本」微縮膠卷No. 2, p. 214.

一九三一年，兩位在 Naupur (鄰近今日巴基斯坦北方吉爾吉特市) 從事牧牛的當地村民偶然從地下掘出一些文物，並發現地下埋有建築遺跡：一九三八年，在印度學者 Madhusudan Kaul Shastri 的主持下，對此佛教遺跡進行首次大規模考古發掘，發現大批貝葉寫本(註八)：之後不同學者陸續進行過數次探勘，最後一次的系統性考察是一九五六年由義大利藏學家 Giuseppe Tucci (1894-1984) 主持進行，再發掘出一批梵文佛典。該地出土的這批梵文佛教文獻，學界通稱為「吉爾吉特寫本」(Gilgit Manuscript)，目前大部分典藏於新德里的印度國家博物館，大致可分六十五部。以書寫材質而言，僅一部為棕櫚樹葉所製成，其餘均為樺樹皮的貝葉。以抄寫字體而言，可分婆羅米體 (Brahmi) 與初期夏惹達體兩種：七世紀初 Patola Sani 王朝肇建時期使用婆羅米體抄寫經典，這是當時北印度的主流字體；約在六二〇至六三〇年前後，漸改採用初期夏惹達體書寫。(註七) 寫本內容多屬大乘佛典，如《八千頌般若經》、《藥師經》、《法華經》、《金光明經》、《月燈三昧經》、《大乘莊嚴寶王經》等，乃至《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甚至有不少

再度臣服吐蕃，「勃律」一名未再見於漢文史料。此地王朝臣服吐蕃後，《吐蕃歷史文書》保存後續發展的記錄，藏文對該地名稱為 bru sha、shru sal、gru zha 等不同音譯拼法，學者大多認為如此地名的來源是因吐蕃統治時期當地已由現今稱為 Burusho 的這個族群所主導。(註五)，故得此名，但《吐蕃歷史文書》也未有其宗教信仰的相關記載。八世紀後的波斯文與阿拉伯文史籍，多以 Bolor 或其近似音稱呼該地，與唐代官方地名「勃律」相通，現可確認都是源自 Patola/Palato/Palata/Palolo 的衍化音轉。「勃律」本非地理名詞，而是王朝頭銜，因此 Patola Sani 王朝或可概稱為「勃律王朝」。

我們對於吉爾吉特地區過去一度盛行佛教的瞭解，則是與上世紀初該地出土的梵文貝葉佛典有直接關連，這批文獻多年來經許多學者的分力解讀，取得相當不錯的研究成果；但也直至二十世紀末，學界方能描繪出 Patola Sani 王朝大乘佛教發展內涵的大致脈絡。由於此批文獻和這些具銘文佛像在近年得以辨識有所關連，故略作闡述。

陀羅尼類經典，因此可知該王朝不僅盛行大乘佛教，也兼具密乘內容。(圖五)

在「吉爾吉特寫本」發現前，學者完全不知 Patola Sani 王朝之名。寫本多具備施者跋文，常記有國王名號與一些貴族人名，發掘敦煌藏經洞文獻的史坦因 (Aurel Stein, 1862-1943) 最早指出該批寫本跋文記載的國王名稱前大多兼具 Patola 名號，他也點出此王朝承襲從前貴霜王朝的習俗，採用源自波斯傳統的 Sani 一詞作為其王銜。(註八) 自他指出此特徵後，學者陸續有新發現得以印證其說，從而逐步建構出此王朝的大略王統世系。另一方面，歐洲考古學者在吉爾吉特地區長年從事摩崖石刻的調查研究(註九)，在當地發現許多佛像佛塔的岩畫，其旁常有國王或比丘 (bhiksu) 署名的禮敬語句，這些材料經解讀後，也拿來與寫本文獻互相印證。(圖六)

以上所述過去學者對「吉爾吉特寫本」與吉爾吉特岩刻的研究成果都成為本文所探討這尊銅佛像的佐證，例如：佛像銘文所提及的這位 Navasurendriyaranandi 國王，在「吉爾吉特寫本」中，存有三部梵文《大孔雀明王陀羅尼 (Mahāvajrāvalī-vidyarājī-dhāraṇī)》，其跋文記載此佛典是由他與

抵長安)，對其宗教與文化略為記錄：「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麤弊，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濫。」

約近百年後赴印朝聖的新羅僧人慧超(七〇四~七八三)，他於七三三~七二七年間經絲路赴印朝聖，在其《往五天竺國傳》中，對該地已採用與《新唐書》及《冊府元龜》一樣的唐代官方名稱「勃律」，並明述「大勃律」與「小勃律」之別：「又迦葉彌羅國東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國。揚同國。娑播慈國。此三國並屬吐蕃所管。衣著言音人風並別。著皮裘氈衫靴懷等也。地狹小。山川極險。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寶。……又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七日程。至小勃律國。此屬漢國所管。衣著人風。飲食言音。與大勃律相似。著氈衫及靴剪其鬚髮。頭上纏疊布一條。(註三) 女人在髮。貧多富少。山川狹小。田種不多。其山樵杭。元無樹木及於諸草。其

大勃律。元是小勃律王所住之處。為吐蕃來逼。走入小勃律國坐。首領百姓。在彼大勃律不來。」

依玄奘與慧超的概述，可知此地確有佛教流傳，可惜未有信仰內容的進一步說明。官方史籍《新唐書》與《冊府元龜》中對該地的記錄主要介於西元六九〇年至七六〇年間，當時正是唐王朝與吐蕃爭奪絲路至中亞主導權的時期，發生多次戰事，因此主要內容都是有關政治情勢的發展，也沒有關於「勃律」風俗文化的記錄。敦煌本藏文《吐蕃歷史文書》曾記載：七二二年，藏王赤德祖贊 (Khrī lde gtsug btsan, reigned 705-755) 派軍攻大勃律(註四)，其王逃至小勃律，此即慧超七二三年路經該地時所記：「其大勃律。元是小勃律王所住之處。為吐蕃來逼。走入小勃律國坐。」

七四七年，安西節度副使—高句麗名將高仙芝(?~七五五)率萬人軍隊分三路進攻小勃律，俘虜小勃律王夫婦，唐改其國號為「歸仁」，西域各國曾一度重新歸附唐朝；七五一年，高仙芝所率唐軍在恒羅斯戰役中敗於大食，唐勢力自此退出中亞西部；七五六年，小勃律及周邊地區



圖8 七世紀初 (ca. 600) 佛座 佛像已佚，銘文記載是皇后Mangalahaṃsikā所施作。紐約魯賓博物館藏 引自<https://www.himalayanart.org/items/65412>，查詢日期：2016年2月10日。



圖7 Paṭola Śāhi王朝第二任國王所供之觀音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藏傳佛教造像》，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頁11。



圖9 七世紀初 (ca. 600) 施依印坐佛 (Enthroned Buddha Granting Boons) 銘文記載此像亦為皇后Mangalahaṃsikā所施作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引自<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76445>，查詢日期：2016年2月10日。

區，年代約為八至九世紀（註十二）；但此像底座有初期夏惹達體的銘文，內容為：
 § [1] Ṭ paṭoladevaśāhi surendrādityanandina,
 意為此像是 Paṭola Śāhi 王朝第二任國王 Surendravikramādityanandi 所供（「吉爾吉特寫本」中有他署名佈施的梵文《藥師經》），此王在位期間約是西元六三〇至

六四四年間，因此認為這是經銘文判定年代最早的佛像。（圖七）
 但近年來又有後續發展，發現該王朝時期更早的佛像：1.二〇〇五年二月，蘇富比拍賣一尊印度造像風格的般若佛母銅像，銘文記載是 Paṭola Śāhi 王朝首任國王 Vajrādityanandi（約七世紀初在位）的

皇后 Anahgadevi 所佈施，並迴向祈願長壽。在吉爾吉特、帕米爾、巴提斯坦交界的 Hatun 地方，也發現具其署名且有紀年（換算後約是西元六七一~六七二年間）的梵文碑文，內容是紀念他下令完成的灌溉渠道。從佛像銘文與 Hatun 碑文的年代記錄，可知此王在位至少達四十年以上。

其餘較院藏此像更早的佛像

自一九七〇年代起，此類 Paṭola Śāhi 王朝的佛像陸續從西藏經由未知管道流出，開始在印度與喜馬拉雅藝術的文物市場出現，初時學者多判為喀什米爾風格佛像，隨後在部分具銘文佛像為收藏者所購藏後，邀請學者進行解讀，方漸瞭解其來源。法國學者 Gérard Fussman 在其一九九三年的論文中，結合比對「吉爾吉特寫本」跋文、

Patola Śāhi 王朝時期佛像約有十餘尊，至近年仍不斷有新發現，有些是從文物市場後續流出，有些則是典藏單位或西藏寺院的舊佛像經學者解讀後重新判定而確認。在研究院「佛陀形影」展的圖錄中，那時曾簡述院藏此尊是目前確認屬 Paṭola Śāhi 王朝時期佛像中年代第二早的佛像，這是根據 Oskar von Hinüber 二〇〇四年專著中的論述：他發現北京故宮《藏傳佛教造像》一書中有一尊編號第十號的「思惟觀音菩薩坐像」，該圖錄記載此為清宮舊藏，源自斯瓦特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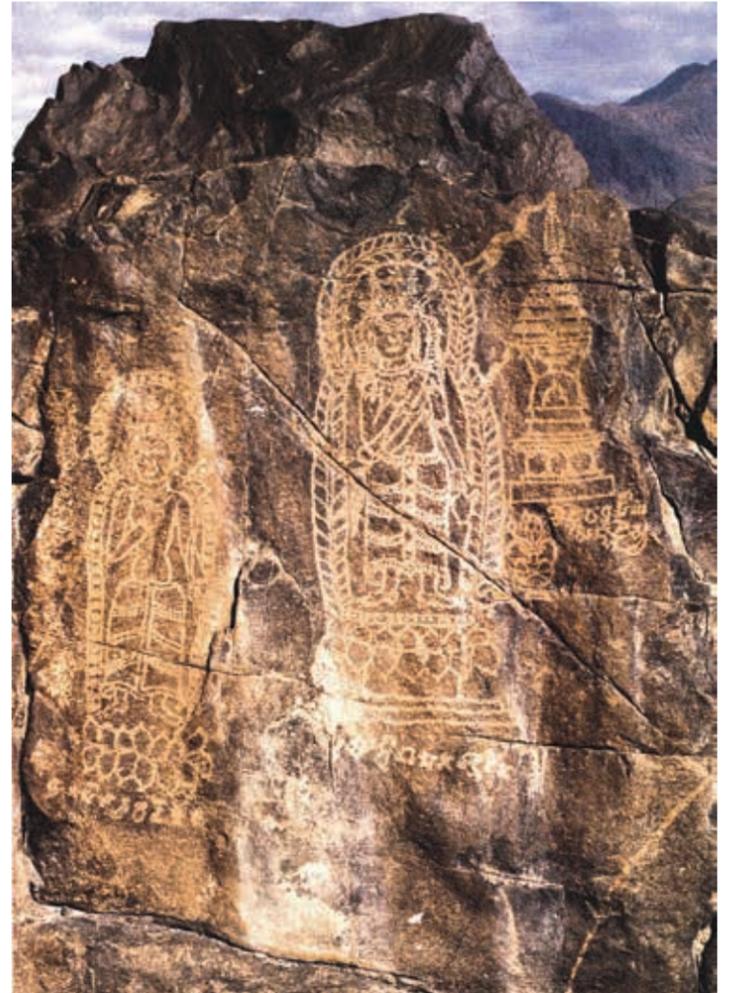


圖6 吉爾吉特當地發現的佛教岩畫 引自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vol.1, Plate 158.

Hatun 與 Chilas 的岩刻佛像記載，以及幾尊具銘文的所謂「喀什米爾銅佛」，指出這些都是同一文化群，即 Paṭola Śāhi 王朝，他是最早作出此聯結的學者。（註十）瑞士學者 Ulrich von Schroeder 在他於二〇〇一年出版的專書《西藏的佛教雕塑》第一卷中，首次列出專章〈吉爾吉特谷地的 Paṭola Śāhi 王朝 (Paṭola-Śāhi Dynasty of the Gilgit Valley)〉討論此類佛像的藝術風格（註十一），書中不僅收入已公布的具銘文佛像，也首度公開一尊未為人知的私人藏品，並列入多尊雖未具銘文，但從藝術風格上判定應是 Paṭola Śāhi 王朝時期的佛像。

皇后 Mangalahamsika 所供養。2. 紐約市專門典藏喜瑪拉雅與西藏藝術的魯賓博物館 (Rubin Museum) 收入一個已無佛像的黃銅底座，其上銘文經解讀後，亦是皇后 Mangalahamsika 所供養。(圖八) 3.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於二〇一一年購藏入一尊銅佛，銘文記載也是由皇后 Mangalahamsika 供養。(註十三) 附帶可做旁證說明的是：「古爾吉特寫本」中有兩份婆羅米字體的梵文陀羅尼殘本，其跋文記有國王



圖10 紐約Pritzker Collection中的彌勒銅像，銘文記載由Nandivikramādityanandī國王於716年施作。引自*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vol. 5, p. 40, Fig. 7.

Vajrādityanandi 與此位皇后 Mangalahamsika 的名銜。(圖九)

結語

其他具銘文的 Patola Sahi 王朝佛像不乏狀況頗佳的精品，但年代都較院藏此尊為晚，如美國著名的佛教藝術收藏家 Pritzker 先生收有一尊保存完好的彌勒銅像，佛座兩側有脇侍菩薩及三位供養人，銘文記載是西



圖11 布達拉宮「三界殿」中所供佛像，銘文記載為西元680年。引自*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ol. 1, p. 114, Plate 22A: Crowned Buddha with Stūpas.

(二二) 所擁有。(註十四)

學界根據文獻與考古材料所作的年代推斷，認為 Patola Sahi 王朝大致始自七世紀初，約至七六〇年左右為吐蕃所併，該王朝的佛像應當也是因此進入藏區，輾轉流傳至後弘期以來的西藏佛教寺院，部分甚至作為貢品呈於清宮。西藏古寺典藏的印度佛像中，另一類自印度流傳入藏而可和這些 Patola Sahi 王朝佛像相類比的即是喀什米爾 Kakola 王朝 (約西元六二六—八五〇年間) 的佛像，也有不少具銘文者，其中年代最早的約是七世紀後半葉，部分佛像在流傳入藏後另刻上藏文的收藏者題記銘文，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十一世紀初古格王朝王子 Nāgarāja 署名收藏的佛像，布達拉宮即有十五尊，北京故宮亦有典藏。

Patola Sahi 王朝的佛像，可大致歸納為幾點特色：1. 藝術風格受斯瓦特與喀什米爾兩方面的影響，因此也有學者將其視為喀什米爾造像風格的支流。2. 佛像若具耳飾，多為左右不對稱形式。3. 習慣將佛像施主以供養人姿態塑於主尊兩側，甚至包含施主家族成員，院藏此像即為典型範例。4. 若具銘文，行文具固定格式，如年代數字前常以 *sanivat* 為始，施主頭銜多為「大

誠信優婆塞」(mahāśraddhopsaka) 或「最上優婆塞」(paramopāsaka) 之類。

院藏此尊佛像雖不是 Patola Sahi 王朝佛像中年代最早的，但若以具確切年號記錄而論，此像是目前所知最早者。相信尚

有一些此類佛像藏於西藏或喜馬拉雅地區的寺院中未為人所知，期待有心人士的繼續發掘與考察，將有助於我們更深入理解印藏佛教藝術的源流脈絡與影響發展。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von Hinüber, Oskar. *Die Patola Sahis: Ihre Steininschriften, Inschriften auf Bronzen, Handschriftenkolophone und Schutzzauber.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von Gilgit und Chilas.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 vol. 5,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04, pp. 28-31.
2. Stüdmak, John. *The Hindu-Buddhist sculpture of ancient Kashmir and its influences*. Leiden: Brill, 2013, pp. 306-308. 他是位研究印度、喜馬拉雅以及伊斯蘭藝術的獨立學者，牛津大學博士，長年在倫敦佳士得工作。
3. 此記載可與院藏此像的側面供養人頭飾相比。
4. 此位藏王曾迎娶年方十四歲的金城公主，但也與唐朝發生多次軍事衝突。
5. Burnusho 指現在巴基斯坦北方吉爾吉特地區使用 Burnushask 語的族群，目前約有十萬人，該語族歷史背景複雜，受周邊許多民族語言的影響，字彙來源有波斯語、藏語、阿拉伯語、喀什米爾語、烏爾都語等。
6. 多年來，許多學者受印度學者 Nalinaksha Dutt 的看法影響，認為該處為佛塔遺跡，此批梵文佛典是作為「法舍利」經儀式而埋入塔內。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修正看法，認為該遺跡不是佛塔，實為僧舍，此批佛典是僧侶的個人藏書與施主贈書。見 Gérard Fussman, "Dans quel type de bâtiment furent trouvés les
7. Patola Sahi 王朝銅佛銘文均為初期夏惹達體，此字體於八世紀後演化為喀什米爾地區流行的夏惹達體。
8. Stein, M.A. "Archaeological Notes from the Hindukush Reg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6, issue 1-2(1944): pp. 5-24.
9. 德國考古學者 Karl Jettmar (1918-2002) 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在該地進行長期探勘，一九八〇—一九八三年間，在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下，他組成歐洲研究團隊對該地岩刻碑銘進行系統性的全面記錄，後發表極豐富的研究成果。
10. Fussman, Gérard. "Chilas, Hatun et Les Bronzes Boddhiques du Cachemire." In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 vol. 2, pp. 1-59.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93.
11. Von Schroeder, Ulrich.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ol. 1: *India & Nepal*. Hong Kong: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2001.
12. 王家驊主編，《藏傳佛教造像》，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頁十。
13. 參考網址：<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76445>，瀏覽日期：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一日。
14. Lobsang Nyima Laurent. "Lha bla ma Zhi ba 'od's Eight Century Bronze from Gilgit." *Revue d'Études Tibétaines* 26 (2013): pp. 195-214.